

穆青散文

M U Q I N G S A N W E N



新华出版社

穆青散文

M U Q I N G

S A N W E N

藏书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青散文/穆青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011-6406-1

I. 穆… II. 穆…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7446 号

穆青散文

穆 青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插页 2 张 26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06-1/I·381 定价: 20.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目 录

意外地走上新闻岗位.....	(1)
第一次采访.....	(6)
毛主席与我的一次谈话	(15)
难忘的清凉山岁月	(19)
从延安到东北	(26)
在围困长春的战场上	(34)
记忆中的一片白云	(42)
泪洒偏关	(46)
忆雪垠老师	(55)
难忘华山	(61)
挥泪送冷西	(73)
涑水情	(77)
心上的树	(86)
潘从正墓碑	(94)
难忘那双手	(95)
情系人民.....	(101)

蝶雪.....	(115)
金字塔夕照.....	(118)
霹雳雨雾.....	(122)
黑色的礁石.....	(129)
沙漠中的玫瑰.....	(133)
救救非洲.....	(137)
在诗情画意的背后.....	(142)
阿玛社长.....	(145)
迷人的广场.....	(151)
亚玛尼·穆斯塔法.....	(155)
陷车记.....	(160)
在瀑布之乡.....	(164)
法蒂玛.....	(171)
阿丽小姐.....	(179)
神秘的马丘比丘.....	(184)
“大地之肺”.....	(189)
思乡者.....	(195)
世界树王.....	(201)
十月的罗马.....	(205)
在斜塔下.....	(211)
水城威尼斯.....	(216)
佛罗伦萨的启示.....	(220)
欣赏《最后的晚餐》.....	(224)

斯卡拉大剧院.....	(227)
西西里木偶.....	(230)
维也纳的旋律.....	(233)
三个向导.....	(238)
蓝色的海岸.....	(244)
一代名厨.....	(248)
鲜花的海洋.....	(253)
马德拉之夜.....	(256)
亚速尔漫笔.....	(261)
快乐的赶车人.....	(266)
罗拉.....	(272)
波兰的心.....	(279)
难忘的城.....	(283)
荒原、岩石、苍蝇.....	(288)
感恩节和圣母节.....	(293)
狮子正张开大口.....	(299)
编后记.....	(303)

PA66103

意外地走上新闻岗位

——我的记者生涯之一

从一篇稿子说起

影响一个人一生的重要转折，起因往往是一两件不太显眼的事。

当我回忆自己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时，我觉得必须从我在陇东部队时写的一篇通讯稿谈起。因为如果没有那篇稿子，或者那篇文章没有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很可能我就不会走上记者之路。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从前方部队来到延安，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鲁艺从我们那一届开始实行两年学制，最后半年是实习期。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就学完了预定课程，我和十几个同学随之被分配到驻扎在陇东专区（以甘肃庆阳为中心）的三八五旅实习。

在旅部过完春节后，我到驻扎在曲子县的二团二营，教授文化课，主要是帮助战士们识字写字。当时部队里文化学习的风气很浓，一到上文化课，战士们一个个热情高涨。作为文化教员，我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染了，忍不住写了篇稿子：《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投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没想到竟被该报刊登了。可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报纸从延安到我们那里要走半个多月。

现在看这篇小通讯，内容比较单薄，也谈不上有多少文采，

但这篇东西所以被报社看中，也许是考虑它会对部队的文化学习起些推动作用。在这以前我只能算报纸的读者，根本不知道新闻的ABC，脑子里没有框框，几乎全用事实说话。文章没有空讲学习的重要性，也没有写什么领导部署、下面如何安排执行等一套东西，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当时就想用各种生动的事实来烘托主题。文中还引用了许多战士的语言，比如像“学习了文化，写信看信都不求人，省得小子们拿架子，请些冤枉客”之类。现在读起来还很风趣。文章结尾处我又着力描写了两个有意思的镜头，一个是战士学写字的情形：“战士们抢着给我铺纸，给我磨墨，而且斥责那些挤得离我太近因而摇晃桌子的人。我每写一个字，他们都争着读出那个字音”；另一个是窗户上的两只眼睛：“每天晚上当我和团里的教育干事们讨论学习情况时，我总能看到窗户上有一对对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们。当问他们为什么每天站在这里时，他们小声回答，这些都是大知识分子，天天晚上讨论科学，现在不听听，将来他们要走呢。”

我想，报社编辑能看上这篇稿子，恐怕就是觉得它和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大一样吧！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新闻该怎么写，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歪打正着”。但这篇文章的发表，也确实带给我一些思考：要想得到富有生活气息的东西，一定要深入下去。很多细节单靠问是问不出来的。比如你去采访，别人一般不会告诉你一个出公差的勤务员因为忘带课本而从三里外的地方跑回来，也不会告诉你炊事员是怎样拿起未烧尽的木柴在地上划着初学的生字。只会告诉你“我们是怎么动员的，现在有多少人已经认了多少字，有多少人会写信了”等等，像“两只眼睛”这样的细节，也只有靠自己去发现。现在看来，这些思考和体会，使我在以后的采访写作中均获益匪浅。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初学写作的小通讯，竟给我带来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大事。

走进报社

当登载我这篇文章的报纸还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学校就打来电报，通知我和文学系同学张铁夫速回延安。当时，我们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在心里猜测着，一边匆匆忙忙地上路。车是不可能有的，只能甩开脚板走。从庆阳到延安步行需要四五天时间。一路上几乎都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满山的荒草和杂树，风一起，瑟瑟作响，让人心里发毛。夜宿深山里的小店，满墙上都挂着虎皮豹皮。因为有野兽，所以过山的时候就像《水浒传》里所写的那样，要凑足十几个人一起走，手里还不能离棍子。我们一路上有时和做生意的人结伴，有时和砍木头的人同行。

到了延安，已是七月，离正式毕业还有一个多月。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找我们谈话，我们才知道被急召回来的原因：原来《解放日报》改版后，要充实编辑和记者力量，中央决定从鲁艺文学系选十个人到报社工作，学校考虑的名单中就包括我和张铁夫。

说实在的，当时我不想去报社，张铁夫也一样。那时候鲁艺文学系的学生，个个都做着作家梦。在一年半的学习期内，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外文学，就我自己来说，几乎读完了鲁艺图书馆里仅有的一些文学类藏书。夏天，同学们在延河边散步，互相谈诗论文；冬天，大家围坐在窑洞的火盆边，评作家，谈作品，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样的氛围中，年轻的心很容易被文学之火点燃，而且烧得很旺。而当时党的新闻事业才刚刚起步，人们对记者这种职业还没有多少认识。我写给《解放日报》的那篇新闻稿，在很多文学系同学眼里是不屑一顾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实习期间，除了写那篇通讯之外，我还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我的乡亲》，写一个被日本人抓到东北的河南劳工所遭受的非人生活的故事。同那篇通讯比起来，这篇小说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要重得多，花的精力也最大。稿子寄给当时延安的一个文学刊物，主编丁玲看后说准备用，但不久刊物停刊，稿子也没要回来，只

好作罢，但我对文学的痴迷却丝毫未减。同学们也劝我别去，说系里已经跟好多人谈过话了，大家都不去。

于是，我向组织表示不愿去当记者，并提出两点理由：一是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当记者得到处活动，与人交际，我不合适；二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都在文学创作上，根本不知道记者该怎么当，怎么干好？没想到学校竟坦率地告诉我，别人不去还可以商量，你不去不行，是报社点名要你的，说你给他们写过通讯，人家说很好。

至此，我才知道事情原来是由那篇稿子引起的。听到别人表扬自己的文章，我当然高兴，但这毕竟关系到我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此便让我放弃文学去从事新闻，总觉得不甘心。事情就这样拖了两个多月，其间学校老师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都先后找我和张铁夫谈过话，一开始还和我们俩人一块谈，后来就分开“各个击破”。最后，周扬同志亲自出马找了我们。周扬当时是鲁艺的副院长，主持工作，威信很高，我们对他既尊敬又有点怕。

记得那天晚饭后周扬约我们去延河边谈心。听完我们讲的理由后，他说，文学和新闻是相通的，许多作家都是从记者成长起来的。你们想搞创作，先去当记者，体验生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也是一种积累，很有好处。最后周扬说，这是中央交下的任务，你们俩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完成，这也是一次对党性的考验。不要有畏难情绪，共产党员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你们会干好的。

尽管那时我们还很年轻，党龄也不长，但对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还是了解的。顺着延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后，我们彻底被周扬说服了。也真怪，思想一通，情绪便随之高涨起来。我们想，既然党信任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干好。于是，第二天便背起背包，走进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的大门。

不几天，适逢“九·一”记者节，那天胡乔木同志（当时任毛主席秘书）来报社同大家共庆节日。得知我和张铁夫是新来的记者，便专门召见我们。他对我们说：新闻工作是我党一个重要的新兴的阵地，需要一些有志青年，从这里开创和发展我们无产

阶级的新闻事业。这是一个光荣的岗位，值得为它贡献毕生的精力。他又说，我知道你们是学文学的，新闻与文学虽有不同，但又是相通的。新闻反映现实斗争并为之服务比文学更直接、更迅速，它不妨碍你们在深入生活、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优秀的作品。他鼓励我们好好为之。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开始新闻生涯的第一课。至此，我已经完全定下心来，老老实实地从头学起了新闻业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事业上的第一步。尽管我的第一步是因为革命的需要，由党为我作出了选择，没有按照个人设计的方向去走，但回首往事，我却一点也不后悔，相反，还常常暗自庆幸。正是有了这第一步，使我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步一步，走过了六十年难忘的记者生涯。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第一次采访

——我的记者生涯之二

碰上了一个“老实疙瘩”

每个记者对于自己新闻生涯中的第一次采访，都会留下难忘的记忆。而我在第一次采访时便碰到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进入《解放日报》不久，对新闻刚刚有了些感性认识，我和张铁夫就接受了一个任务——采访当时边区的模范工人赵占魁。大概当时报社里实在抽不出人手，或者是领导有意给我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才让我们两个新来的年轻人挑起这份重担。报社在分配给我们任务时，就强调说这是一次重要的采访，一定要搞好。

尽管我们内心都有点忐忑不安，但想到这是当记者的“第一炮”，无论如何也得干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来到当时的中央职工委员会，因为赵占魁这个典型是由他们向报社推荐的，所以我们想先从这里开始了解一些情况。

对于我们的采访，中央职工委员会非常重视，开始，由邓发主席接见我们，随后他就让另一个负责人李颀伯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从他们的口中，我们得知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的一名老工人，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当时边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爱护工厂，团结工人，埋头苦干，一切为着革命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的劳动态度和宝贵品质，是边区工

人阶级的典范。李颀伯说，现在，边区面临着日寇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物资短缺，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在农业战线上，我们已经树立了一个劳动模范吴满有，但工业战线上还没有让广大职工学习的典型。形势急需我们用赵占魁的这种精神，感召和激励全体职工，加速发展边区自己的工业。他最后说，赵占魁身上先进而感人的事迹很多，希望你们深入采访，好好宣传这个典型，使之成为教育边区全体职工的生动教材。

听完李颀伯的介绍，我们感到很振奋，同时也觉得此行的任务不轻松，内心更迫切地希望见到这个可敬的老工人。第二天，我们稍事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位于延安西北的温家沟。三十多里的山路，沟沟壑壑，崎岖难行。我和张铁夫每人背着个背包，手里都拿着一根木棍。那时候出门采访，这就是全部的行头。包里除了毛巾牙刷之外只有两支新领的铅笔，几本采访本。说是本子，其实就是把一叠油光纸钉在一起的。木棍主要是当手杖用，既可以在过河时用它来试水的深浅，也可以对付偶尔出沒的狼和野狗。

温家沟是个不大的山村，当时的边区农具厂就设在它附近的山沟里。山坡上层层窑洞，山脚下几排平房和几座大棚，就是工厂的全貌。这个厂名叫农具厂，实际上主要是制造手榴弹，修理枪械，也附带生产一些犁、铧、铁锹等农具。

当我们在厂长徐驰和生产科长的引领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大棚里的熔铁炉边，见到正在高温下挥汗如雨的赵占魁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艰难的采访。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赵占魁，年龄大概有四十五六岁，披了件破棉袄。那时候边区的生产条件极其简陋，连化铁炉前的工人也穿不上石棉衣，夏天也得穿上棉袄，遮挡飞进的火花和高温的烘烤。因为出汗太多，他的棉袄表面渍着一层白花花的汗碱，戴的那顶草帽也被汗水渍破了，露出豁豁牙牙的边缘。由于工厂里没有任何降温的设备，长期呆在高温下，他只能张大嘴不停地喘

气，露出一排很突出的门牙。当厂领导把我们介绍给他时，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只是咧开嘴笑笑，表示一下欢迎的意思，既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也没有多说几句话。

本来我们都是初当记者，不知道应该怎样采访。在来工厂的路上，我俩曾边走边商量过，设想了很多问题，觉得只要赵占魁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有足够的材料。没想到，我们第一次采访，竟碰上了一个“老实疙瘩”。经过几次单独面对面的访谈，任凭我们怎么问，他总是憨憨地笑一笑，不是说：“没啥”，就是说：“这是俺该做的”。

面对这一情景，一时之间，我和张铁夫都急得满头大汗，刚开始的那股兴奋劲儿此刻再也提不起来了。

怎么办？看来短时间从赵占魁口中是问不出个所以然了，而报社又在等我们的稿子，情急之下，我们灵机一动，干脆先从外围入手，采访厂领导和赵占魁身边的工友，请他们来谈谈对赵占魁的印象和认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太对了。当我们来到工人中间，一提起赵占魁，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们访问了和赵占魁一同来延安的老工人，访问了工厂的干部和其他车间的工友，还访问了给赵占魁打下手的学徒，他们纷纷用朴实而生动的话语，数说着老赵的好处。有人说，别看老赵脸黑，心可好；又有人说，他这人从不发牢骚，遇到不高兴的事，就先找人讨论讨论，然后再提意见；有人说他这人遇事宁肯自己吃亏，不叫别人说闲话；还有人说他技术好，但从从不拿架子，而是手把手地教别人。……总之，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到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几乎都谈到了。为了更全面一点，我们还特意访问了工厂所在地的农民，一个在小河边锄地的六十多岁的老汉，提起赵占魁，就激动地说：“好人，天下数第一的好人”，然后就扳着指头给我们讲赵占魁怎么省吃俭用，把钱借给有困难的老百姓；谁家的娃没人照看，赵占魁就领到工厂，还下挂面给他吃……

听着这些发自内心的赞誉，我们的精神又振奋起来，觉得这是很好的材料，如果把这些话如实地写下来，不就是很有说服力

的文章吗？于是，我俩一合计，决定先写一篇《人们在谈论着赵占魁》。

终于打开了话匣子

第一篇初稿写出来后，我们越看越觉得这是一个浑身都闪光的人物。但这篇文章毕竟都是一些旁观者的感性材料。赵占魁从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来延安之前有着怎样的经历？是什么使他这样忘我地工作？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怎么样？是什么让他具有这样善良而宝贵的品质？这些问题仅靠这篇文章显然无法回答。如果就这样回报社交差，既不能算完成任务，就是我们自己也很不甘心。

但要了解更多的情况，除非赵占魁自己开口。

就在我们重新陷入困境的时候，厂长徐驰的一席话使我们深受启发。这个同济大学毕业、戴着眼镜的厂长，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谈起赵占魁，他说：“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总是把自己装饰得很圆满，甚至他能说得使人家把他很瘦的身体当成一个大胖子。可是你也能找到一种完全相反的人，那就不能不提到赵占魁了。对于自己的好处，自己从来没讲过。但是只要你和他在一块呆上三天，你就不会不佩服他。对于他，一个只看表面的人，是不能很正确地了解他的。”

至此，我们明白了，赵占魁之所以很难开口，固然有他性格上的原因，但关键还是我们的采访不够深入，仅仅一味地傻问是不行的，必须要想办法贴近他。于是，我们便向徐驰提出让我俩下车间，给赵占魁当学徒，打下手，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想在共同生活中接近他，互相多一些了解，即使不能让他多说话，也能使我们有些切身的感受。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白天和赵占魁一起呆在炙热的熔炉边，他生火，我们给拉风箱；他翻砂，我们就和学徒们一起学着做砂箱，还不时地给他倒杯水，卷支烟，或者拧一个冷毛巾递给

他，让他休息一会儿。收工时，我们便和他一起整理工具，打扫车间，然后一起吃饭，一起打水洗脚，夜里就同他并排睡在一个炕上。就这样，一天、两天……朝夕相处的生活逐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老实说，我们从内心里喜欢上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而赵占魁也和我们日益亲近起来，话匣子终于慢慢打开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了解了他的苦难的身世。这个来自山西定襄县的老工人，自幼家贫如洗，父亲一直漂泊在口外，老母亲也不得不离开家给有钱人洗衣做饭。他弟兄四人，自己排行第三，从十二岁起就和两个哥哥给人家当雇工，尽管这样，还是连小弟弟都养不活，不得不送给别人。他十七岁那年，父亲被塌下来的破窑砸死，二哥听到消息连夜奔丧，在途中过河时不幸又被水淹死。桩桩惨痛的事，强烈地刺激着赵占魁的心，从此，他变得沉默寡言。随后，因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先给铁匠当学徒，终年伴着风箱铁锤。几年后辗转漂泊到太原、西安等地，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当冶炼工人，病了没人管，还经常被工头打骂，克扣工资，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虽然这样，到一九三二年工厂缩减时，他既没有人情，又无钱活动，还是被开除了。从此他就过着流浪生活。直到一九三八年来到延安，才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党组织先是把他送到工人学校学习，并且根据他的表现，很快发展他为共产党员，随后又分配他到农具厂，当上了翻砂股的负责人。想起以前所受的苦难，比较现在的生活，他感动不已。他说：“在旧社会，我的血快被挤干了，而今四十多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

从此，赵占魁焕发出了火一样的工作热情，他真正把工厂当成了家，事事处处都表现出主人翁意识。在工作中，他成了一个忘我的人；和同事相处，他又成了一个关怀他人和团结同志的核心。是苦难的经历使他养成了勤劳和节俭的美德，而党组织的关怀和教育更使他懂得了为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奋斗的意义。至此，我们终于体会了什么是赵占魁精神以及这一精神的深刻内涵。

几天后，当我们和赵占魁依依不舍地告别，匆匆赶回报社

时，俩人都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老赵写好。

惊险的写稿之夜

怀揣着记得密密麻麻的采访本，我们回到报社。有关领导听完我们的汇报并且看过第一篇稿子后，决定先发这篇《人们在谈论着赵占魁》，同时要求我们尽快写出第二篇主要报道赵占魁模范事迹的通讯。

自己的劳动成果初步得到了承认，我和张铁夫都很兴奋，决定趁热打铁，熬夜也要拿出稿子。

当时的《解放日报》，条件非常简陋，办公和宿舍都在清凉山上几排窑洞里，人多了窑洞不够住，新来的同志只能住在山脚下。我们住的地方是由一间老乡放杂物的旧房改造的，隔壁就是老百姓家的猪圈。天气稍微热一点，空气中就到处是臊臭味。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摆着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一开始，我的床是靠后墙放着的，但是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后墙有点渗水，我就把床挪到侧墙，抵着屋角放起来。这样可以就着窗前的桌子，坐在床上和铁夫一起写稿子。

当晚，我们给油灯添满了油，并搓了两根灯芯，打开采访本，边讨论边写起来。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夹杂着电闪雷鸣，我们只顾埋头写稿，丝毫没有在意。

大概是快半夜的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初稿的框架，感到又累又饿，于是就找来一些报纸和干柴，生起火，用搪瓷缸子煮了点白水挂面，权当夜餐。谁知刚刚吃完，就发现后墙墙根被山上流下来的雨水冲开了一个口子，水“哗、哗”地流进了屋内。这下我们可紧张了，赶紧找一些旧报纸破草鞋去堵，后来又从院子里拣来一些碎砖头把我的一条破棉裤也塞了进去，好不容易才把口子堵住。这时，外面的雨小了，我们也累得筋疲力尽，看看问题不大，便各自脱衣上床睡觉了。